

辛亥
百年

名家经典导读

辛亥 烈士

XINHAILESHI SHIWENXUAN

诗文选



本书收选辛亥革命时期的三十多位烈士的诗文。其诗文因饱含着忧愤和热泪而显得格外沉重，可谓声声血泪，句句铿锵……

主编 戴逸 注译 李小菊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名家经典导读

辛亥烈士诗文选

XINHAİLIESHI SHI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李小菊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辛亥烈士诗文选 / 李小菊注译.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5

ISBN 978-7-80752-803-6

I. ①辛… II. ①李… III. ①诗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26 ②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71364号

辛亥烈士诗文选

XINHAILIESHISHI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李小菊

责任编辑 陈红

封面设计 张科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 行 科 028-86259422 86259423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1mm × 225mm

印 张 12.2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2-803-6

定 价 23.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 028-84122206

序 言

戴 逸 杨东梁

十四年前，我们曾编辑过一套《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 39 册，由巴蜀书社出版。当时，我们诚邀了十几位在京的文史专家和出版社的几位高级编审组成编委会，同时，约请了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共同成就了此套丛书。

之所以要编辑该丛书，是要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一点近代中国人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寻求救国、救民之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在祖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逐渐觉醒，奋起抗争。许多仁人志士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独立、民族复兴呼啸着前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中国近代文学就充分突出了爱国主义这个主旋律，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跨过道道难关，迎来光明的前程。而今天的青年人既没有一百多年前那种举步维艰、风雨如磐的感受，也缺少较为丰富而形象的近代历史知识。阅读近代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则可以引领他们进入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聆听其心声，体察其情感，品味其所思所求，从而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那段路程。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完全意

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与巴蜀书社商定，从《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选出十二种，分别编成两套丛书：一套冠名为《辛亥百年——名家经典导读》，共收六种，即：《孙中山文选》、《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诗文选》、《辛亥烈士诗文选》、《章太炎诗文选》、《康有为诗文选》、《梁启超诗文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遗著，其中不乏思想深邃、语言犀利、富有文采的名篇佳作。

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是革命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们或因操劳革命，英年早逝；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为宪法流血”第一人；或极富理论才华，却惨死在军阀屠刀之下。他们的诗文都有强烈的爱国、战斗精神，但其艺术风格却不尽相同，或慷慨悲壮，或清新淳朴；或奔放，或含蓄；或犀利，或深邃；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我们还选收了三十多位辛亥烈士的诗文遗作，这些烈士具有坚定而高昂的革命斗志，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把生命的价值与祖国的富强、同胞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其诗文有的是临阵发出的誓言，有的是临刑留下的遗篇，真可谓声声血泪，句句铿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页。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那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尖锐地批驳了保皇派的谬论，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广，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晚年虽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但也不过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

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但在辛亥时期也是政坛和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他们宣传保皇，反对革命，追求君主立宪，与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辩论。把康、梁的诗文收在《辛亥百年》丛书中，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辛亥时期涌动着的不同思潮，展现出的不同政治主张。须知，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更何况康、梁也曾经位列中国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中，也曾一度领舆论之风骚，只不过当时代继续前进时，他们未能追上潮流，成了落伍者。

另一套丛书冠名为《强国之梦——近代名文导读》，共收录了《近代实业文选》、《近代法制文选》、《近代教育文选》、《近代报刊文选》、《近代经世文选》、《近代名人日记选》共六种。这是从文学体裁角度入手，选编近代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发出的声声呐喊。

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围绕如何使中国转弱为强的现实问题，提出“兴实业”、“振商务”，学习西方。有人更身体力行，将“实业救国”论付诸实践；近代的爱国者在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还提出了改革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种种主张和方案，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进步；至于教育，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时至近代，有人甚至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资产阶级革命家则提出“革命之教育”，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近代报刊也在中华大地上勃然兴起。开始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

纸，至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他们鼓吹以西学为师，变法图强。甲午战争后，办报形成热潮，并成为传播启蒙思想，宣传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辛亥之后，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报刊文具有时效性、纪实性和趣味性，自然得到读者的青睐，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到近代经世文，顾名思义则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物，它宣扬进化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标榜“采西学”，开风气，睁眼看世界，力图为纠封建末世之“时弊”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近代名人日记涉及近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往往是亲历亲为，可作为其他史籍的佐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再则，有些日记出自文学名家之手，更显得细腻生动，文采斐然。

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编辑这两套丛书，一是出于巴蜀书社的积极推动，二是有诸多作者的大力支持。由于巴蜀书社的编辑先生们精心策划，反复推敲；各位作者兢兢业业，认真修订，终于得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将两套面目一新的丛书奉献于读者面前，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在我们今天重温旧章之时，其中两位作者——桑咸之教授、林庆元教授却已驾鹤西去，这让我们唏嘘不已，悲痛系之！两套新版丛书的推出，也是对他们的纪念吧。

2011 年 4 月于北京

前言

1911年（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终结束，历史上称之为“辛亥革命”。

本书选录辛亥革命时期33位烈士的诗文作品，共75篇（首），名曰《辛亥烈士诗文选》。

—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依靠船坚炮利，强行撞开中国的大门，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中国便由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劳动力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尤其是19世纪末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20世纪初年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了，中国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这主要表现在（1）中国的领土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以及澳门、香港、九龙、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等地先后被英、法、德、俄、葡等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割占或租借；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十几个中国的重要城市里，帝国主义列强设置了各自的租界地，实行殖民统治，侵犯甚至完全排斥中国在租界中保有的主权；在中国的统治中心北京，

帝国主义列强把他们在中国的使馆区武装成侵略者的独立王国，由各国公使组成的公使团对中国内政进行直接的干预和控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进驻中国的各大城市和军事要地，当然也包括北京的使馆区。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政治主权都被严重地破坏了。（2）围绕着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此把他们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牢牢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清政府偿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的机会，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勒索和政治奴役。在他们所提供的每一笔大借款的背后，都附加着极为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便是以当时清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海关税收作抵押，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收入，也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外国商品大量倾销的情况下，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崩溃倒闭。中国的经济主权被严重地破坏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华民族的危机景象，正如陈天华烈士所说的那样：“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秋瑾烈士在诗中写道：“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权失当思复，时危敢顾身！”的确，在那个时代，亡国的危机，像声声警钟震撼着每一位爱国者的心，催促他们走上救亡的道路，辛亥烈士就是怀着亡国的悲愤和救国的热望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外国势力入侵面前，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倒行逆施，把维护封建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作为最高目的。在经济上，以偿付赔款、实行“新政”等名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在政治上，顽固拒绝一切根本的改革，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爱国行为，并且玩弄欺骗手段。而在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则奴颜婢膝，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换取洋人主子的支持和保护。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对外国的组织，各省官吏对所属境内发生“伤害诸国人民”事件，

必须立即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自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统治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成为“洋人的朝廷”^①。一位辛亥革命史专家写道：“既然清政府把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毫不奇怪，人民大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②继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起义暴动此起彼伏，遍及全国，成为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大事件的最广阔的社会背景，也是辛亥革命广泛而坚定的力量源泉。革命烈士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确信“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他呼吁同胞们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二

早在1894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檀香山（夏威夷群岛首府火奴鲁鲁）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当时一批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和主张的进步知识分子（主要是留学生）成为这场新的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并发挥领导作用。20世纪初年，由进步知识分子组建的革命团体纷纷涌现，主要有：1904年2月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等人长沙组建的华兴会；1904年7月，由吕大森、胡瑛、刘静庵、朱元成等人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11月，由陶成章、龚宝铨、章炳麟在上海组织的光复会和1906年2月继科补所之后成立的、湖北地区又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等。这些

①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6页。

②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0页。

革命团体或者联络民间的反清组织会党的力量，或者侧重于在新军（清末仿照欧美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中开展工作，积极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8月20日，为了适应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补所等革命团体都参加进来。同盟会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盟会还着手制定出《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革命的指导性文件，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从这时起，直到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受其影响的革命志士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艰苦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实践活动，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在革命力量尚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无所畏惧，英勇斗争，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铺垫通往胜利的道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惊天动地、悲壮感人的一页。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鼓吹、起义、暗杀”这三个方面。

所谓“鼓吹”，就是通过办报纸、杂志，撰写文章和小册子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这时期的革命宣传品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为一代有志之士投身革命救国事业的战斗号角。邹容，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广泛阅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英法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逐步形成了坚定的革命民主思想，并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中。1903年，他的《革命军》一书七章两万余字在上海出版。在这本书中，邹容高度赞美近代英法美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无情揭露清朝统治者蛮横专制、骄奢淫逸、媚外卖国的丑恶行径，悲愤地描述出广大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政治欺压、经济剥削和种族歧视，他号召同胞们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

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陈天华，这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文豪，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革命文章和小册子。在著名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中，他深刻地揭露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贪婪野心，揭露出清政府充当外国侵略势力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一本质面目，把祖国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生动地向人们讲述出来，他写道：“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在邹、陈二人的革命宣传著作中，炽热的爱国情怀、激昂的革命精神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谓“起义”，是指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发动新军进行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人就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这次被称为“乙未广州起义”的行动，虽然还未发动就失败了，但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反清斗争的开始。此后，尤其是1905年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革命志士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十余次，主要有：（1）1906年底到1907年初由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此次起义声势壮大，众多的矿工、农民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清政府调集了鄂、湘、赣、苏四省重兵前往镇压，起义失败。刘道一、蔡绍南及起义军领袖数十人被捕牺牲。起义期间，另一位已被监禁的湖南革命斗争领导人禹之谟也被反动派杀害。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湖北的革命党人胡瑛、朱元成、刘静庵、殷子衡等策划响应，被叛徒出卖，同时被捕。朱元成、刘静庵先后死于狱中。（2）1907年3月到1908年4、5月间，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潮惠钦廉起义和河口起义。（3）1907年7月光复会皖浙起义，起义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先后被捕遇害。但在安庆起义中，堂堂清安徽巡抚恩铭遭徐锡麟、陈伯平等刺杀而死，震惊了清朝统治者。（4）1908年11月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5）1910年2月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这两次起义是革命党人

发动新军进行的，显示出与以往起义不同的特点。（6）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是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最为壮烈的一次起义。许多起义成员如黄兴、林觉民、方声洞等在起义前都写下了绝命书，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念头。起义者一度攻占了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后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此次起义死难80余人，本书作者中罗仲霍、林文、方声洞、林觉民、饶国樑、陈与燊、陈更新、李晚、余东雄、郭继枚诸烈士都在这次起义中壮烈牺牲。烈士们惊天动地的革命气概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起到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促进辛亥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7）1911年夏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这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把已经批准由地方集股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改为官办，实际上是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行径，激起两湖、广东、四川铁路股东及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其中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广泛激烈。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吴玉章等趁机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一度宣告荣县独立。龙鸣剑因积劳成疾，殉身革命。1911年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光复了武昌全城。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在不到五十天里，全国就有14个省和上海先后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直接控制的直鲁豫地区，吴禄贞、白毓昆、熊朝霖等革命党人不畏险恶，策划、发动武装起义，先后被反动派杀害。

所谓“暗杀”，是指由个人或少数人进行的对清政府重要官员的谋杀。当时一些革命党人，深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①，把暗杀视为革命的重要手段，在革命党组织中，专门设有暗杀部，负责研制炸弹等暗杀武

① 民粹派：19世纪中叶，沙皇统治时期，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又称虚无党，多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主张用炸弹代替文字，专门从事破坏沙皇政府组织和暗杀政府要人的活动。

器，组织暗杀活动。1910年成立于香港的支那暗杀团就是同盟会所属的暗杀组织，宗旨是暗杀清朝文武要员，以推进革命。本书作者中吴樾、温生才、陈敬岳和彭家珍诸烈士都是在暗杀活动中壮烈牺牲的^①。

三

辛亥革命烈士的诗文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

1. 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

如果说所有辛亥烈士的诗文作品都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祖国危难的关头，这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祖国山川景物、历史文化的深情赞美，而是表现为对可爱的祖国惨遭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山河破碎、疮痍满目的满腔悲愤和深深的耻辱；表现为对清政府倒行逆施、媚外卖国行径的激烈抨击；表现为对历史上如屈原、祖逖、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救国忧民、舍生赴义的英雄人物的崇敬和追思；表现为对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中苦苦挣扎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切同情；还表现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秋瑾烈士在诗文中，痛斥清政府面对外国侵略势力，“彼乃举其防家贼、媚异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的丑恶行径，表达出和志士男儿一样强烈的救国责任心：“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罗仲霍烈士在《辛亥春返国留别诸同志》一诗中写道：“陨霜杀草一何悲，赤子扶扶捧首啼。忍见铜驼卧荆棘，神州遍地劫灰飞。”忧国一何深，忧民一何切！我们能够感觉到烈士的诗笔因饱蘸着忧愤和热泪而显得格外沉重！

2. 坚定的革命信念

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就是革命

① 对于辛亥烈士的暗杀活动应作具体分析，请见本书吴樾等烈士的作品提示。

爱国。它要求推翻反动的清王朝，结束几千年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这一时代特征反映在烈士的诗文作品中，就是炽热的爱国热情同坚定的革命信念的紧密结合。辛亥烈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具体表现为对人类进步革命的赞美，对“赤铁主义”的崇尚以及对以武力推翻清王朝所抱的坚定主张和必胜信心。邹容烈士在《革命军》一书中，热烈赞美英法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革命是“能使中国大地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的唯一途径，他禁不住大声呼喊：“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我中国其革命！我中国其革命！”朱元成烈士临终前，口述如下诗句：“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这种坚定而高昂的革命激情是辛亥烈士诗文中的最强音，而当它一旦出自女革命家秋瑾的笔下，就更加显得豪气万丈！请看她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一诗：“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世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正是这种“愿将热血造世界”（罗仲霍烈士诗句）的豪迈的革命斗志和“沧桑有变心难易”（陈更新烈士诗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得辛亥烈士们在险恶的革命斗争中，在凶残的反动势力面前，表现得异常勇敢，异常坚强。“男儿死耳果何悲，断体焚身任所为。寄语同胞须努力，燕然早建荡夷碑。”这就是熊朝霖烈士临刑前留下的诗篇。

3. 高尚的献身精神

辛亥烈士是如何对待个人、家庭与祖国之间的关系呢？在他们看来，生命诚然可贵，亲情更难以割舍，但是为了挽救苦难的祖国，为了替天下人谋求幸福，他们宁愿投身革命，选择死亡。林觉民烈士在遗书中对爱妻说：“吾至爱汝！”“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

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是多么感人的话语，多么令人钦佩的献身精神呀！方声洞烈士在遗书中写道：“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把生命的意义同祖国的富强、同胞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认为男儿在世，为祖国、为同胞奋斗而死是义之所在，是乐之所在。在那些选择以暗杀的方式向清王朝发难的辛亥烈士身上，革命者无所畏惧，为国捐躯的高尚精神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突出。

四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辛亥烈士的诗文作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作为封建大地主、大官僚的总代表这一阶级本质的认识不够清楚；又如诗文中往往流露出一些悲观苦闷、怨天尤人的思想情绪。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出的“驱除鞑虏”即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口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它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由满族贵族集团建立的，它所实行的封建统治带有明显的种族压迫色彩，因而“驱除鞑虏”的口号也必然含有反抗种族欺压，推翻异民族统治的内容，然而时代的发展决定这并不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和本质性的内容。当时的革命党人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满情绪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满宣传往往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少数清朝封建统治者同全体满族人民区别开来，而是过于强调推翻异民族统治，鼓吹种族偏见和种族复仇情绪，这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真正意义，给革命带来消极影响。在本书作者秋瑾和邹容等的诗文作品中，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有时表

现得很激烈。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即把满族人民排除于祖国大家庭之外，甚至还使用一些污蔑谩骂的语言，对于这种情况，应当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

在辛亥烈士的诗文作品中，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不够清楚，看不到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往往认为由于中国自身的腐败无能，人民愚昧无知，因而才引来了外祸。陈天华烈士说：“吾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鲜之亡也，亦朝鲜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日俄战争本来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在中国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可陈天华烈士认为：“平心而论，日本此次之战，不可谓于东亚全无功也。倘无日本一战，则中国已瓜分亦不可知。”这种观点代表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的模糊认识。

在如何看待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广大下层社会“人心薄弱，不克自立”（秋瑾语），“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陈天华语）。正由于他们看不到蕴藏在广大下层人民中的迫切的反帝反封建愿望和巨大的革命力量，因而不能深入到劳动人民之中，做艰苦的发动组织工作，而只是依靠中等社会的少数“精英”分子，只寄希望于利用现成的会党和新军的力量，进行军事冒险，一旦受到挫折，就容易产生英雄世上知音少，苍天苍天不见怜的悲观情绪。秋瑾在《吊吴烈士樾》中感叹：“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劳流血叹无功。”并为“年年岁岁驹驰隙，有汉光复总无策”的现状感到焦虑苦闷。当她得知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烈士死难的消息后，在绝命词中写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甚至像陈天华、陈天听、杨笃生等烈士在革命事业受到挫折时，悲观绝望，竟选择了以死殉国的道路。